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七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编

紫禁城出版社

目 录

一 汝窑

- 关于宋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孙新民 (1)
- 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 郭木森 (7)
- 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新发现与再认识 赵文军 郭木森 李德敏 (14)
- 20 世纪汝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吕 军 (19)
- 汝州市城东汝窑址的调查与认识 陈宏焱 裴 涛 陈少禄 (27)
- 关于汝窑窑场性质的讨论 周丽丽 (32)
- 汝窑的性质及相关诸问题 吕成龙 (39)
- 析“汝窑”的性质 蔡 毅 (48)
- 关于汝官窑问题的几点思考 李广宁 张 勇 (54)
- 汝窑及相关问题三则 李建毛 (59)
- 汝窑研究四则 张 东 (65)
- 汝窑史料研究二则 李仲谋 (73)
- 汝官窑的釉色、质感及鱼鳞纹 张福康 陶光仪 袁海清 (84)
- 汝窑传世器物研究 冯小琦 王莉英 (92)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汝窑瓷器 陈润民 郑 宏 (105)
- 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一件汝窑盏托 柯玫瑰 (109)
- 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件汝窑鱼纹笔洗 毕宗陶 李秋星 (113)
- 略谈清雍正朝仿汝瓷 董健丽 (115)
- 宋汝窑青瓷与仿品的 X 荧光分析比较 刘 伟 张 燕 (119)
- 宝丰汝窑出土标本及有关问题探讨 陆明华 (127)
- 简述广东省博物馆藏汝瓷标本 冯素阁 (136)

二 河南其他窑口瓷器

- 古钧州的钧窑 爱杜阿尔多·阿丰索·库尼 (140)
- 清代御窑厂的仿钧窑瓷器 王光尧 (143)
- 宋钧与清钧的对比研究 江 松 (148)
- 钧窑窑变釉的创烧与发展 毛杰英 (155)
- 宋代钧窑釉中的“蚯蚓走泥纹”的成因探讨 李 铎 (160)
- 钧窑瓷器赏析 杨爱玲 (163)
- 传统钧瓷生产工艺 阎夫立 丁建中 (168)
- 钧窑瓷器类型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 郭学雷 (175)
- 故宫旧藏宋钧窑瓷器浅谈 王健华 赵聪月 (190)
- 广西乳光釉与河南钧釉的关系 周 华 (195)
- 鹤壁窑的青瓷和钧瓷 王文强 (201)
- 浅谈当阳峪窑宋代酱釉瓷器 任拥军 (207)
- 镇江出土的河南窑口瓷器 王书敏 霍 强 (211)
- 河南临汝窑的窑口分布和装饰艺术 赵青云 赵文斌 (219)
- 越窑与汝窑的对比研究 林士民 (223)
- 介绍两件馆藏唐代花釉瓷器 典瑞宇 娄金山 (230)

三 其他地区和国家窑口瓷器

- 青瓷镂空有胆莲花尊 刘丽文 (233)
- 依据纪年资料对宋金定窑的观察研究 刘 涛 (237)
- 试析廊坊西永丰辽墓白瓷器 张兆祥 (247)
- 北宋景德镇窑的贡瓷问题 肖发标 (253)
- 高丽青瓷的装饰分类研究 刘 毅 (263)
- 试论高丽青瓷 王 旭 (268)

附录

- 杭州凤凰山麓老虎洞出土瓷片的工艺研究 李家治等 (271)

存目

后记

关于宋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孙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汝窑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1950年陈万里先生考察汝窑，首先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①；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试掘，发现典型的御用汝瓷器10余件，遂将宝丰清凉寺瓷窑址确定为汝官窑^②；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清凉寺村内搬迁四户村民，发现窑炉15座和作坊2处，出土了一大批比较完整的汝官窑瓷器、窑具和模具，终于找到了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③。

伴随着汝窑的发现历程，汝窑的研究大致可以1987年为界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主要以探寻汝窑窑址为主，对河南境内临汝（今汝州市）、宝丰、鲁山等县的瓷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汝境内^④。由于一直寻找汝窑未果，叶喆民先生根据1977年在宝丰清凉寺窑址采集到的1件汝窑青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并与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1985年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⑤。1986年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在看到宝丰瓷厂王留现采集的1件汝窑天青釉洗后，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并于1987年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⑥。后段是在确定宝丰清凉寺为汝窑遗址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87—1989^⑦、1998—2000年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研究者根据考古成果各抒己见，围绕窑址的发现、定名、性质和年代，以及汝窑与钧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达成了普遍共识，有的仍然莫衷一是。本人曾参与了汝窑址的后五次考古发掘工作，谨就汝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识者。

一 清凉寺与青龙寺

按照考古学的习惯，遗址前均冠以现地名，以示与其它同类遗址相区别。因此，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后，一直称其为“清凉寺瓷窑址”。但20世纪五十年代初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提到该窑址时却是“宝丰大营镇青龙寺”。最近有学者也提出“宝丰窑址地名‘清凉寺’抑或是‘青龙寺’问题”：“今日所谓清凉寺窑址的名称和与上列诸寺对比看来还值得认真探讨一番，至少也说明三十年前村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文章原来所记的‘青龙寺’窑址是有一定根据的。”^⑧

究竟是清凉寺还是青龙寺呢？近年出版的《宝丰县志》“文物古迹”专章中，除列有“清凉寺汝瓷窑址”外，还列有“清凉寺”条目：“亦名青龙寺，位于县城西20公里的清凉寺村内。宋建隆四年（963年）创建。曾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嘉庆八年（1803年）重修。清末遭兵灾，仅存殿宇4间。”^⑨据此看来，清凉寺也称作青龙寺，是历史上称作青龙寺还是近代才称作青龙寺，新编县志没有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新编县志第三章“行政区划”，附有“1947年1月宝丰县地图”：在韩庄村北今清凉寺村位置标明的是“清凉寺”。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宝丰县志》卷首“舆图”内有“宝八里分图”：在韩庄村北，也为“清凉寺”村名。该志卷五“建置志下”列有“寺观”条目：“清凉寺在寿峰寺（在县西麓，万历四十年重修）迤东，万历九年重修，邑生王之仁撰碑文。”^⑩由此看来，明万历九年（1581年）重修时即称作清凉寺。

近年，我们在发掘宝丰清凉寺窑址时，十分留意当地的碑刻资料，但万历九年重修清凉寺碑没有找到。只在今清凉寺村内的清凉寺庙墙壁上发现1碑，碑名为“补修佛殿碑记”。其碑文曰：“宝邑西五十里许，旧有清凉寺，不知创之何时，历年旧远，墙壁颓废。……俟主李松林撰。……嘉庆八年三月十九日谷旦。”据此碑文，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此地就“旧有清凉寺”，村以寺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直至解放前的1947年，这里一直被称作清凉寺。所谓“青龙寺”名称，恐是因发音近似，当地人念“转音”的缘故。

二 汝官与民汝

《汝窑的发现》一书在论及“民汝”与“汝官”的关系时提到：“民汝窑是一种在工

艺上类似汝官，而胎釉制作较粗的青瓷器。”“民汝与汝官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或者宝丰清凉寺窑生产的民汝器尚待有新的发现。”《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也在“官汝窑来源于民汝窑”一节中认为：“官汝窑建立之前，已有民汝窑的烧造，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文献才有‘汝窑为魁’之誉，并为宫廷看中而烧造贡瓷，进而又建立起官窑”^①。两书尽管在汝窑的来源上有所争议，但都认为在“汝官”或“官汝”之前有一个“民汝”阶段。

上述两书所说的“民汝”，显然是指一种介于临汝窑青瓷和汝官窑瓷器之间的过渡期器物，那么这种器物到底如何呢？如果说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前几次考古发掘，由于只是在民窑区进行，虽然也有零星的汝官窑瓷片出土，尚不能理清汝窑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脉络的话，那么2000年度汝窑中心烧造区的发现与发掘，则使我们有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

2000年度的考古发掘，共开5×5米探方20个，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这次发掘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文化堆积比较丰富的区域，除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为明清时期扰乱层外，第三、四、五层均为北宋时期文化堆积层。其中第三层瓷片堆积丰富，天青釉瓷器占总数量的99%以上，传世汝窑瓷器绝大多数可在本层内找到，表明已达到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第四层和第五层出土遗物较少，以白釉和豆青釉粗瓷为主，天青釉瓷器极少见。此两层内已经出现了在民窑烧造区见不到的窑具，如火照、火照插饼和上面粘接有5个支钉痕的饼状支烧等。出土瓷器中有两种器物值得注意，一种是青绿釉镂空刻花钵，口沿下一周镂空，外壁面等距刻划六枝牡丹，内壁上对称刻划四朵莲花，底心处雕刻一只奔鹿，鹿口衔有一枝灵芝，构图疏朗，刻工精湛。通体施满釉，唯圈足内留有五枚圆形支烧痕，制作工艺讲究，造型新颖别致。此类钵的釉色和纹饰同于民窑烧造区青瓷，而满釉支烧工艺则与汝窑瓷器一致，由于出土有一定的数量，有的还与匣钵粘连在一起，故应属于清凉寺窑址的产品。另一种器物是青灰釉洗，敞口，斜直壁，深腹，外裹足较高，底面上凸现有轮旋痕，五枚支烧痕较大。该洗在造型上完全摆脱了民窑烧造区青瓷的风格，其釉色、造型和支烧工艺也与汝窑瓷器十分接近，只是在制作上稍逊工整，天青釉色略显灰暗，大约处于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

上述两种器物中，青绿釉镂空刻花钵不见于清凉寺窑址的民窑烧造区，如果不是这次在汝窑中心烧造区发掘出土，其犀利的刻花风格一般会误认为是耀州窑产品。由此可见，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中：“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说法还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尽管在青瓷器的烧造上，宝丰清凉寺窑始烧于北宋早期，耀州窑创烧于唐末，耀州窑较清凉寺窑要早，但无论是青瓷刻、印花图案，还是制作及烧造工艺，宝丰清凉寺窑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否则就很难理解北宋晚期朝廷“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了。而青灰釉裹足洗，具有

汝窑瓷器创烧阶段的原始特征,使我们看到了所谓“民汝”瓷器的真面目。据此我们认为,汝窑瓷器的发展过程可能是:先由青绿釉刻花镂空钵过渡到青灰釉裹足洗,然后烧制出成熟的汝窑天青釉瓷器。综上所述,汝窑瓷器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自身不断总结经验,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

三 汝窑器类与装饰

过去,研究者多从汝窑传世品出发,认为“在造型上,官汝窑瓷器为适应宫廷需要而设计的,因而造型凝重古朴,有些器型则源于铜器,如三足樽、出戟尊、三足洗等等,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在装饰上,官汝窑瓷器注重釉色典雅,并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花装饰”^⑩。从而否定宝丰清凉寺窑址中出土的一些生活用具和带有装饰的汝窑瓷器。

首先,传世汝窑瓷器中也不全是陈设用瓷。我们曾统计了国内外所藏的传世汝窑瓷器造型,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件三牺尊被考证为清代仿制外,计有出戟尊、纸槌瓶、胆式瓶、玉壶春瓶、椭圆水仙盆、弦纹三足樽、莲花式碗、敞口圈足碗、椭圆凹足洗、浅腹三足洗、圆形圈足洗、深腹平底洗、葵瓣盏托、葵口盘、浅腹盘和小碟等16种。这些瓷器中的碗、盘、盏托和小碟等器类,显然是生活用具而非陈设用瓷。

其次,文献记载的汝窑瓷器也有不少是生活用具。据周密《武林旧事》一书:张俊向宋高宗进奉的贡物中,有汝窑瓷器16件,分别为酒瓶1对、洗1、香炉1、盒1、香球1、盏4、盂2、出香1对、大奩1、小奩1。其中的酒瓶、香炉、盒、盏、盂等器类,也无疑是日常生活用具。同时,叶真的《坦斋笔衡》明确指出:“本朝以定州白瓷有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可见,定窑白瓷因覆烧在口部留下芒边为宫廷所弃用,才改用汝州烧制的青瓷器,而芒口边器物恰恰以碗、盘类器物为多。南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我们知道,定窑白瓷是生产生活用具的窑口,从宫廷“唯用汝器”的情况分析,绝不仅仅是把汝窑产品专作陈设用瓷,也应主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

最后,2000年度在汝窑中心烧造区的发掘,使我们对汝窑产品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据对出土遗物的初步整理,可以确定的器类有瓶、盒、樽、碗、洗、盘、碟、盏、壶、钵、炉、盏托、套盒、器盖等10余种,而每一种器类往往又有多种造型。其中,瓶有梅瓶、胆式瓶、盘口瓶和玉壶春瓶,洗有敞口圈足、直腹三足、浅腹凹足和深腹平底;碗有莲花式高圈足、敞口深腹直圈足、敞口曲腹外裹足,盆有宽沿弧壁假圈足、唇口直壁大圈足、椭圆形四足;盏托分花式盘碗形托、圆盘凸起一托和平底盘中部凸起一圆环者,套盒也有圆形浅盘和六边形委角等形制。可以说,传世品中的器类除出

戟尊尚未发现外，其余器类均有出土，不少器形为传世品中所未见，而上述碗、盘、盆、盏托、套盒等出土量最多的器类皆为日常生活用具。

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器形的表面还饰以纹饰，以莲纹为最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如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薰炉的炉壁模印仰莲，盏托的托壁刻以覆莲，碗外壁上模印多层莲瓣，盒盖的顶部刻划有盘龙图案等，并有鸟体、龙身等雕塑，形象逼真，制作精致。上述器物的胎质、釉色均与汝窑瓷器相一致，又出土于同一地层，从而大大丰富了汝窑瓷器的品种。

综上所述，汝窑瓷器的器类既有部分陈设用瓷，又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具；大多数器物为素面是以釉色取胜，但也有少部分器物表面装饰有花纹图案。清皇宫内的传世品仅是历代相传保留下来的很少一部分，能够保留下来的器物就在于它是陈设用瓷惹人喜爱，而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则会在当时使用中损毁被扔掉。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传世品中无此类器物，就认定它一定不是汝窑瓷器。

四 汝窑瓷器的年代

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根据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和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之间。《中国陶瓷史》一书即持此说。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⑬。《宋代官窑瓷器》一书在否定了北宋汴京官窑之后，提出“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5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历史”。

关于汝窑瓷器的年代问题，我们可以从民窑烧造区和汝窑中心烧造区两个方面来论述。宝丰清凉寺瓷窑址的前4次考古发掘，均是在清凉寺村南的民窑烧造区进行。这里的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文化层可分为四至六层，一般厚1.5—2.2米。根据各层内出土的铜钱和器物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北宋早、中、晚期和金、元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北宋早期是该窑址的初创时期，以烧制白瓷为主，兼烧少量青瓷和黑瓷。青瓷施釉很薄，釉色尚不稳定，呈现淡青或灰青色。器物以素面为主，仅见少量印花菊纹等装饰。北宋中期为该窑址的发展时期，仍以白瓷为主，但青瓷数量明显增多。施釉均匀，釉层变厚，在装饰上新出现了莲花、牡丹、竖条纹和凸线纹。北宋晚期，该窑址也达到鼎盛时期，青瓷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白瓷，而且器类多样，花纹繁缛。釉色上以豆青和

豆绿釉为主，就出现了少量天青釉瓷器。在装饰上增加了印花龙纹、刻划牡丹和海水游鱼等，并在一件器物上划花和印花并用，即在器表划花、器内印花。金元时期该窑址逐渐走向衰落，青瓷釉色变深，釉面缺乏光泽，釉层内杂有褐色小斑点，器形增大，壁面加厚，器体显得粗笨。由于仅在北宋晚期地层内出土天青釉汝窑瓷器，当时我们推定汝窑瓷器的年代约属哲宗、徽宗时期。

2000年度在汝窑中心烧造区的发掘，我们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叠压关系，将第五、四文化层堆积和相关遗迹划分为第一阶段，第三文化层堆积及相关遗迹划分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在该阶段地层和遗迹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1枚，表明汝窑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二阶段天青釉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99%以上，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这时的匣钵外壁多涂抹一层耐火泥，并大量使用火照和火照插饼，特别注意了烧制过程中窑炉内火候和温度的控制。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₁内清理出1枚“元符通宝”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可能早到宋哲宗时期。

综上所述，对于汝窑的具体烧造年代，尽管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就目前掌握的地层资料看，汝窑的创烧约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而汝窑瓷器的年代可能早到宋哲宗时期。因此，结合宝丰清凉寺民窑区域的发掘成果看，陈万里和叶喆民先生推断汝窑的年代为哲宗、徽宗时期，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注 释

- ①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期。
-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11期。
- ③ 郭木森、赵文军：《汝官窑瓷器烧造区找到了》，《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8日第1版。
-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与严和店的发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期；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 ⑤ 叶喆民：《钧窑与汝窑》，《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 ⑥ 汪庆正等：《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0月。
-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 ⑧ 叶喆民：《汝窑址发现经过与再考察记略》，《南方文物》2000年4期。
- ⑨ 宝丰县志编纂委员会：《宝丰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10月。
- ⑩ 李仿梧修、耿兴宗纂：《宝丰县志》，清道光十七年刊本。
- ⑪⑫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5月。
- ⑬ 叶喆民：《汝窑廿年考察纪实》，《中国陶瓷》1987年6期。

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

郭木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汝窑在宝丰清凉寺已被陶瓷界所公认，官窑只见于文献记载和为数不多的传世品，学术界对此认识还持有不同见解。近年来，在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一处新的窑址，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系，引起了河南考古界的关注。本文拟将汝窑、文献中的官窑和张公巷窑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汝瓷的创始年代

提起汝瓷的创始年代，首先要弄清楚汝窑的窑址问题。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故都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我们知道定窑覆烧的芒口瓷器始于北宋中期，此时，汝州州治窑场环设，几乎是青瓷一统天下，各俱特色，产品不仅造型多样，而且注重装饰效果，如折枝、缠枝、交枝牡丹和菊花，以及叶纹、波浪、水草、团菊等题材的大量出现。除大量印花纹饰外，还采用了模印间刻的制作方法，表明北宋中期汝州州治青釉瓷已达到鼎盛时期。现在看来，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的“惟用汝器”本意决不是指汝州所有的青釉瓷窑口，既然定窑覆烧的芒口瓷器始于北宋中期，陆游所指只能是北宋中期以后汝州的某一个窑口生产的作品。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汝窑只能是宝丰清凉寺窑。

关于汝瓷的具体创始年代，长期以来在陶瓷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归纳起来，有三

种：

(一) 陈万里先生由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考证，汝州烧官廷用瓷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五年（1106年）年间的20年中^①。宝丰清凉寺窑址第二、三次发掘，根据窑址中御用汝瓷出土的层位及器物特征，将御用汝瓷的烧造年代推断在宋哲宗、宋徽宗时期^②。而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分别进行了第四、五次发掘。值得提及的是，1999年春的第五次发掘找到并确定了宫廷御用汝瓷中心烧造区。虽然没有发现可靠的断代纪年文字和钱币，这两次发掘出土的天青釉御用汝瓷所处的地层年代与第二、三次发掘基本一致。

(二) 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清凉寺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③。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转载宋人叶寘《坦斋笔衡》：“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的记述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将“政和间”记为“宣政间”。从以上三条记载可以看出，北宋大观间（1107—1110年）宫廷设官窑，烧造官窑的时间是政和初年（1111年），停烧于宣和末年（1125年）。从近期的发掘资料看，我们在清凉寺汝窑中心烧造区晚期配釉作坊地面的最下层清理出1枚宋哲宗“元符通宝”（1098—1100年）。元符仅三年，众所周知，一个作坊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十年八年是可能的，由此看来，汝窑的停烧时间大约在徽宗崇宁年间是可能的，大观年间宫廷置官窑也是可信的。至于叶先生将汝窑推测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徽宗宣和末年可能是受汝窑就是官窑的影响，导致汝窑鼎盛时期的错误观点，不足为奇。

(三) 2000年夏、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第四区（御用汝瓷中心烧造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清理出汝官窑窑炉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和釉料坊等相关遗迹，并获得多组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出土一大批形制较完整且品种丰富的御用汝窑瓷片和有别于民窑模具、窑具等。依据地层叠压关系，结合出土的3枚年号钱币，为御用汝瓷创烧年代初步确定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盛烧于宋哲宗时期，大约停烧于宋徽宗初期^④。再次证明了文献记载与陈万里先生考证汝窑的烧造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 御用汝瓷的烧造工艺

御用汝瓷的烧造工艺首先表现在窑炉、窑具和模具在质的变化上。初期的窑炉基本

上是沿用民窑马蹄形，这时期的窑炉每窑可装 30 件左右器物，到了御用汝瓷的鼎盛期，由原来的马蹄形大窑炉，改进为椭圆形小窑炉，每窑只能装烧与 20 厘米左右匣钵配套器物 10 件。初期，绝大多数匣钵外壁不涂抹耐火泥，中期以后，外壁涂抹耐火泥逐渐增多，直到后期阶段，90% 以上匣钵采用外壁涂抹耐火泥工艺。支烧工艺，初创阶段支钉粗壮，饼与支钉皆用一般耐火泥土制成，支钉与饼往往容易脱落。随着汝瓷工艺的成熟，支烧垫饼采用耐高温优质瓷土制成，支钉小而尖，同时出现大量垫圈工艺，垫圈支烧的出现，不仅制作简易、坚固，而且还解决了高支烧器物垫饼支烧不足的缺陷。

清凉寺御用窑不仅窑炉、窑具有其独创之处，模具也别具一格。一般来说，民窑除印花外，素面器物都不使用模制，皆采用手拉坯工艺制成。而御用汝瓷只要能使用模具的器物，都采用模制工艺，如洗、盘、钵、盆、碟、炉和部分碗、盏、套盒等。器物外壁有纹饰的用外模，内外壁无纹饰者皆用内模。大型器或不便使用模具的器物如各类樽、器盖等，以手拉坯工艺为主。

御用汝瓷的烧造方法：主要采用支烧法，即用各类匣钵一钵一器烧制而成。完全支烧的器物有各类洗（裹足、深腹、平底）、盘（裹足、假圈足、三足、平底）、碟、钵、盆（裹足、假圈足、四足、平底）、尊等。碗类器，除裹足碗皆支烧外，直圈足花式口也有满釉支烧，个别的敞口小矮圈足碗支烧于圈足面上，垫烧占绝大多数。瓶的种类繁多，满釉支烧仅见于盘口折肩瓶和个别矮圈足小型瓶类器上。盏托、盏、套盒比较特殊，这类器物以垫烧为主，满釉者，三个或五个支钉横置圈足底面上，个别较矮套盒支烧在盘底面上。盏亦有如此。一般情况下支钉的多少与器物的大小有关，常见的支钉有三个和五个，六个支钉仅见于椭圆形水仙盆^⑤。

御用汝瓷胎骨薄而坚，质灰或灰中泛褐，俗称“香灰色”。釉色莹润凝厚，视如碧玉，有天青、粉青、淡天青、卵青、月白、青绿等各种釉色，实际上可用天青、青绿两种釉色来概括。从发掘出土大量瓷片标本观察，以天青类为主，釉色变化大，青绿变化小，基本上保持原色不变。这两种基本色泽只是在烧制停火过程中还原气氛的不同而产生出所谓的淡天青、卵青、青灰、月白等釉色，很难说是当时人为有意区分的。从发掘出土的大量标本中就很难找到釉色完全一致的器物。色泽的不同，除了烧制、停火还原气氛因素外，土蚀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传世品还可能存在着氧化作用。在传世品汝瓷中，一般不见印花和刻花装饰。近年发掘中出土不少有龙纹、莲花、牡丹等纹饰，并发现有较多精美镂空装饰和雕塑作品，这在以釉色、开片取胜的汝瓷传世品中实属罕见。

三 汝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考古材料看，定窑覆烧的芒口瓷器始于北宋中期，此时，汝窑青瓷已达到鼎盛时期，与汝御用窑的创烧时间一致^⑥。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亦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里所说的“宣政间”，显然是指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转载宋人叶寘《坦斋笔衡》：“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以上记载无论“京师”或“汴京”，都没有明确说出北宋官窑的具体烧造地点。多年来，陶瓷界将寻找北宋官窑的注意力集中在开封、郑州一带，这是一种误解。从原料到燃料，开封、郑州都不具备烧制官窑瓷器的条件。因此，北宋官窑窑址的所在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作专题论述。

虽然文献记载汝窑、北宋官窑都存在的事实，多年来，陶瓷界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我们不访就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结合传世品对汝窑、北宋官窑做进一步研究。汝窑自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试掘出土10余件汝窑御用瓷器标本后，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得到了国内外陶瓷界的认可。然而，汝窑疑团尚未完全揭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又进行五次发掘，终于在1999年春找到了汝窑中心烧造区。2000年夏、秋，我们对汝窑中心烧造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除清理出有别于民窑窑炉，模具和窑具外，还出土一大批形制比较完整且品种丰富的御用汝瓷。尤其是北宋晚期地层和澄泥池中出土御用汝瓷占98%以上，器形有碗、盘、碟、盏、盏托、器盖、盆、套盒、钵、盂、洗、樽、梅瓶、鹅颈瓶、盘口折肩瓶、净瓶、炉、方壶、圆壶等^⑦。釉色因土蚀，多数已非原色，从整体上讲，以天青、粉青、淡天青为主，其次月白、卵青、青绿等。从器形、釉色以及工艺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达维特基金会等世界各地传世品近百件形制各异同类汝瓷碗（裹足、直圈足花式口）、盘（裹足、三足平底）、碟、洗（裹足、深腹平底）、盆（椭圆形水仙盆、板沿盆）、瓶（鹅颈瓶、盘口折肩瓶）、盏托、樽完全一致。而民用青瓷、白瓷、黑瓷等占总出土瓷片不足2%，器形以碗、盘、盏为主。这些民用瓷断然不是御用汝窑烧制的产品，实属御用汝窑窑工们的日常生活用瓷。因此，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不是专为宫廷烧造的御用瓷。

汝窑的烧造年代已确定，回过头我们再看北宋官窑。虽然，北宋官窑窑址还没找

到，传世文物俱在。《坦斋笔衡》中“命汝州造青瓷器、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说的清清楚楚，并且明确指出汝窑承前，官窑启后。所以，我们对北宋官窑的存在深信不疑，但要破解“北宋官窑”之谜，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找到它的遗址。

四 汝州张公巷窑址探索

（一）窑址的发现及工艺

1999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汝州市公安局门面房建设工程发掘探方2个，面积37平方米，除出土大量宋、元时期民间生活用瓷外，引人注目的是，在第③层和H1内出土4件（片）天青釉汝瓷，这4件汝瓷与清凉寺御用汝瓷烧造区出土瓷器从胎质、釉色、器形完全一样，应是清凉寺御用汝窑的产品无疑^⑧。巧合的是，2000年春，张公巷一居民盖房挖地基时，发现有匣钵和与其它青瓷窑口不同且近似汝窑御用瓷器碎片。在汝州市政府、文化局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进行抢救性发掘。因受地势的限制，仅开2.5米×10米探沟一条，面积25平方米。以第②层出土瓷片最丰富，白瓷、钧瓷、青瓷（青中泛黄）最多，各占三分之一，豆青瓷次之，白地黑花、黑瓷、三彩最少。值得注意的是青瓷，这类青瓷不同于豆青，也有别于天青。胎薄质细，为汝瓷所不及。同出的还有不少瓷片标本釉色月白、卵白等。我们认为釉色青中泛黄者非原色，应是残次品土蚀所致。胎骨有白中泛粉、灰中泛白和净白等。不见汝窑香灰胎，釉面玻璃感强。器形有洗、盏、碗、瓶、盆等，多数器物采用垫烧，满釉支烧的器物底常见小米状支钉痕，类汝窑芝麻挣钉的极少。较多匣钵也集中于本层，其中近二分之一的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这种现象除清凉寺御用汝窑烧造区使用这类工艺外，民窑烧造区和河南各窑口都不见有用此类工艺。另外，有4件曾使用过的匣钵上残留有青釉烧结面，其中的1件漏斗状匣钵底面残存着一块烧结上的瓷片，其釉色、胎质和本层中出土的青瓷完全一致，表明这些青釉瓷是张公巷窑生产的作品。

第③层和第②层下的灰坑出土遗物较少，与窑址有关的青釉瓷更少，因未发现有可靠的纪年物，时代尚难确定。从这些地层或灰坑内出土的白地黑花、钧瓷都具有金、元时期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在25平方米范围内清理出10个灰坑，出土铜钱近30枚，除H5内出土1枚金海陵王时期“正隆元宝”外，其余皆唐、宋时期钱币。因发掘区内宋代以后地层、灰坑扰乱比较严重，以“正隆元宝”确定窑址的时代不足为据。

（二）汝窑的性质与张公巷窑的关系

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长久以来，笔者曾对南宋人周辉这段记载持怀疑态度，仔细一想，

“内有玛瑙末为釉”，已被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学成份分析所证实，说明南宋人周辉记载是可信的。天青釉的特殊色泽与玛瑙有关，这在陶瓷界已被公认。既然御用汝瓷以玛瑙为釉，表明烧制御用瓷是不惜成本，以奢侈豪华为尚。1987年，河南洛阳安乐乡宋代窖藏出土一批瓷器，其中1件青瓷碗与汝窑瓷十分接近^①。1989年春，在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村发现窖藏瓷器47件^②，器形有洗、盘、碗、钵、盂、瓶等，其釉色、造型以及烧造工艺等皆与清凉寺窑址出土器物相同，这无疑也是清凉寺窑的产品。最近看到汝州汝瓷博物馆收藏的2件洗，据汝瓷博物馆的同志介绍，这两种洗也出自窖藏坑内。以上三例窖藏坑共出土50件汝窑产品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不仅证实了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载：“唯供御拣退后，方许出卖”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做为汝瓷的残次品就视为珍品，藏于地下。众所周知，官窑产品不仅属于非商品性，并且严禁民用。那么宝丰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性质是什么？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里的“命汝州”，显然不是宫廷自制。笔者认为在宫廷命汝州造青瓷器之前，清凉寺窑已在客观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因此，地方官府奉宫廷之命设窑清凉寺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中：“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之说，结合窖藏坑出土的50件汝瓷，可知汝窑尚未完全被宫廷垄断。其性质是“供御”，而不是“贡御”。尽管汝窑尚未被宫廷垄断，它与越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等“贡御”瓷的区别自然迎刃而解，故不赘述。

依据汝州张公巷出土的匣钵外壁涂抹耐火泥工艺和较多类汝窑瓷器特征，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即汝窑早，汝州张公巷窑晚。

（三）汝州张公巷窑的性质

宝丰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发掘，证明传世品御用汝瓷就在此烧造出来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器胎骨细腻坚硬，以粉白胎为主，灰白胎次之，不见有所谓汝瓷香灰胎。张公巷窑产品釉色虽然润泽，实不如汝窑釉质凝厚滋润。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窑具、瓷器特征与宝丰清凉寺御用汝窑工艺非常接近，可以肯定张公巷窑烧造的产品不是一般民间生活用瓷。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记载：“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从考古材料和“北京故宫的旧藏传世品来看”^①，它们之间的情况与曹昭《格古要论》的记载基本一致。所以，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尽管如此，笔者也不完全否定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

注 释

①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 ③ 叶喆民：《汝窑廿年考察纪实》，《中国陶瓷》1987年6期。
- ④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9期。
-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宝丰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新发现》，《华夏考古》2001年3期。
- ⑦ 郭木森、赵文军：《汝官窑瓷器烧造区找到了》，《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8日第1版。
-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河南汝州市区古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3期。
- ⑨ 张剑：《洛阳安乐宋代窑藏瓷器》，《文物》1986年12期。
- ⑩ 赵青云、王黎明：《河南宝丰发现窑藏珍品》，《华夏考古》1990年1期。
- ⑪ 王健华：《宋官窑弦纹瓶与清雍正仿品》，《文物天地》2001年1期。

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新发现与再认识

赵文军 郭木森 李德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汝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钧、官、哥、定窑齐名于世。该窑址调查于1950年，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等先生都曾进行过实地考察。清凉寺窑遗址位于河南宝丰清凉寺大营镇蛮子营村，迄今为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1987年进行首次试掘，开探方2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现典型御用汝瓷10余件，遂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遗址。1988年和1989年又连续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先后开探方15个，发掘面积1150平方米，发现作坊、水井、灰坑、澄泥池和排水沟等与制瓷有关的遗迹多处，出土各类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1100余件，以及瓷片近千包，从地层上确定了汝官窑瓷器的具体年代。

为了整理窑址发掘报告和补充窑炉资料，1998年和1999年又进行了两次有目的的重点发掘，1998年发现了4座烧制民用青瓷的窑炉，1999年则找到了汝官窑瓷器中心烧造区。2000年6—12月，在汝官窑中心烧造区开挖探方19个，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清理出窑炉15座、作坊2座、澄泥池1个、澄滤池2个、陶瓮10个、大口缸4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和水井1眼，并获得多组重要的地层关系和一大批典型的天青釉御用汝瓷片和窑具等。

经过调查，清凉寺窑遗址南到韩庄村南，北到清凉寺村北，东到东坡，西到西坡，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出土瓷片品种有白瓷、黑瓷、三彩、影青、青釉印花、汝官瓷、白地黑花、珍珠地、钧瓷、酱黄釉等等，时代从北宋早期一直至金元时期。窑炉有单体窑、联体窑两种。从发掘出土情况看，该遗址是一处综合窑场。其中，从清凉寺塔